

愛教愛國—馬相伯的人生準則

陳方中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提要

馬相伯是清末民初天主教名人，但因其一度離開教會，在有關中國天主教史之研究中較少提及，本文的第一個部份，是對馬相伯作簡單介紹，使讀者瞭解他在一九〇〇年後，中國天主教本地化運動中的重要性，以及他在教內教外受人尊重的情形。

其次，馬相伯因愛國之故，不滿於當時國民政府先攘內後安外的政策，參加被視為左派之「救國會」組織，在中共的定調中把他當成天主教左派，是與所謂「愛國會」思想有聯繫的先驅。其實，馬相伯是基於其宗教家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的背景，進而發展為其抗日愛國的理念，不論是中共定調為左派或右派的天主教人物，都有類似的理念。

要瞭解馬相伯的思想及行為，必須先理解他的信仰；反之，若從世俗眼光去分析，是對馬相伯的誤解。

關鍵詞：馬相伯、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前言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天主教教會，「愛國」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帶有所謂「帝國主義」色彩的傳教士們，一方面是因為對歐洲文明的優越感，另一方面感受到清朝官民的反教敵意，往往將其教友訓練成脫離中國民族的另一族群，教友被要求至少應在「政治問題上保持中立」。馬相伯是這個天主教族群中的異類，他開始參加一些愛國的活動，鼓吹愛國，晚年時甚至被稱為「愛國老人」。本文即是探討他一生中的兩種重要思想——愛教與愛國。

馬相伯作為清末民初天主教名人，著名天主教歷史學者方豪對他極為欽慕。一九三八年曾在廣西桂林風洞山拜見馬相伯，方豪說：「余以小先生七十歲之後生小子，謁先生於風洞山，執弟子禮。」¹因馬相伯同時的社會清望，一九三九年去世未久，張若谷即有《馬相伯先生年譜》，但蒐集資料尚不完備。抗戰結束後，方豪自重慶返回南京，他說：「寓石鼓路天主堂，而余之寢室即昔日先生之書齋，於是得暢讀其藏書。」²又得主持堂務的副主教張路加同意，或副錄，或收藏了馬相伯的文稿及相關文獻。然後方豪北上在北平主持上智編譯館，再搜求不少馬相伯、英斂之、陳援庵談道論學之文，遂出版《馬相伯文集》，日後陸續補充續編、新編，以此為基礎，方豪先生完成了《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這其實是以馬相伯先生為經的中國近代天主教史編年。

朱維錚，江蘇無錫人，復旦大學教授。一九八八年得舊金山大學利氏學社馬愛德神父之助，開始進行馬相伯的研究工作，十年後，迄今搜羅最為完整的《馬相伯集》於焉出版。方豪的《馬相伯文集、續編、新編》是其基礎，但精於清末文化發展及文人網絡的朱氏，對前者作了校正與補充。朱維錚的學生李天綱在馬愛德神父協助下，對於馬相伯當年離開耶穌會的原因，有了更明確翔實的說明。不過方豪的《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因係刊登在《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第六七期，此學報

¹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上），《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第六期，頁1（台北：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1974年8月出版）。

² 同上著作，頁2。

未久停刊，朱維錚未能得見，是為其《馬相伯集》中最大缺憾。

當方豪神父教學政大時，吾尚在中小學。方神父去世前年餘，將其大部份藏書贈予政大；予就讀政大研究所時，為蒐集撰寫論文資料，倘伴於方豪藏書室中，方豪神父所蒐集的馬相伯資料，乃吾碩士論文的四分之一。其實吾所知馬相伯一切，皆自方豪神父來；以後朱維錚氏復編有完整精詳的《馬相伯集》，吾不能掠人之美，本篇所論，絕大多數引自二位師長而已。

壹、生平際遇

第一階段：朝聖路途（一八四〇～一八七六）

馬相伯，原籍江蘇丹陽，但生在丹徒（鎮江）。其父母都來自丹陽馬家村，是虔誠的教友世家，按照馬家的傳統說法，他們認為明末利瑪竇以來他們就是天主教教友。³依馬氏家譜，他們可上推至元朝的馬端臨。馬相伯的大哥名建勳；姐嫁青浦朱氏為妻，生子志堯，是以後上海有名的企業家。又有子開敏，是首批六位國籍主教之一。其弟名建忠，在中國近代史上較馬相伯更早成名。先生譜名欽善，又名建常，字斯臧。後改名良，字相伯。號若石，乃其聖名也，別署求在我者，晚號華封老人。

4

馬相伯小時家境不差，曾入塾讀書；他晚年回憶不喜填鴨式童蒙教育，但其古文根柢實奠基於此。母親嚴格督課，亦使馬相伯熟讀四書五經。如果馬相伯的回憶

³ 〈一日一談〉四十三〈我的孩童時代與宇宙觀與家教〉，《馬相伯集》頁 113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2 月一版）及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馬相伯集》，頁 1227。

⁴ 方豪，〈馬相伯先生生日考及其他〉，《方豪六十自訂稿》，頁 2015-2016（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五十六年出版）。馬相伯另有二兄，皆早夭。

無誤，他曾參加縣裏的考試取得了生員的資格。⁵然後他自己坐了船離家到上海，入依納爵公學（日後改名徐滙公學）讀書。在這裏存在著一個基本的疑問：馬相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獨自離家？沒有資料可以說明他的動機。

他進入依納爵公學後沒有多久，他聰穎的天資及國學程度即受到注意，在每年成績評定中，他經常是名列前茅。以他老教友家庭出身的成份，又表現優異，當然成為耶穌會當局注意的對象。他參加過徐滙公學的聖母會，並且在一八六二年進入耶穌會的初學院成為耶穌會士。⁶在初學階段中的照顧病人一項，是很真實的工作，當時疾疫盛行，難民遍地，馬相伯在蘇州、太倉一帶救護難民，以致自己也得了傷寒，「偃臥六十餘日，幾不起。」他最後恢復了健康，但也有同學瞿光煥因此一病不起。⁷一八六九年他被祝聖為神父，一八七〇年五月底，他通過了關鍵性的耶穌會通考，成績為特優，這意味著他日後可以擔任重要工作。⁸

的確這位耶穌會的明日之星是受到栽培的。由於他對數學的興趣，一八七〇年他被派往南京傳教，並隨蘭廷玉神父繼續習科學；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三年擔任徐滙公學的校長；一八七四年還兼任耶穌會初學院院長。這些工作的性質都可以說是領導性的，與人有關的。但他在一八七五年被調離徐滙公學及初學院，改在徐家滙天文台觀測天文。他日後對天文台的回憶是很負面的，他說：「時徐家滙還沒有現代研究天文的儀器，只有利瑪竇從前用的一架舊儀器。」⁹但是根據耶穌會的資料，一八七二年他們曾開會決定，將在江南代牧區進行科學與文化的研究工作，而馬氏兄弟則是他們培養的口袋人選。¹⁰

⁵ 馬相伯回憶他在一八五二年參加南京鄉試，應該未錄取。當時馬相伯只有十二足歲。

⁶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上），《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第六期，頁 11、20。

⁷ 史式徽著、上海教區史料編寫組譯，《江南傳教史》，第二卷，頁 97-98（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一版）。

⁸ 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馬相伯集》，頁 1244。

⁹ 〈獲得神學博士以後〉，〈一日一談〉（十），《馬相伯集》，頁 1085。馬相伯記憶有誤，徐家滙天文台的儀器最初是一八四二年南格祿神父帶來的，其次是劉德耀神父在一八六五年帶來的，不過帶來的儀器多半與氣象有關。

¹⁰ 史式徽著，《江南傳教史》，卷二，頁 205。

馬相伯不願進行天文觀測工作，轉而譯著數學書籍。在一種不愉快的氣氛中，他又被從徐家匯調往南京。他被調往南京似乎是一種懲戒性質，原因是此前他往徐州進行傳教工作時，向兄長馬建勳請求捐出二千兩白銀賑濟災民；他的長上將這二千兩歸為馬相伯的私產，認為這違反了修道者的安貧誓約，因修道者的財產應由修會支配。在這個反省期中，馬建勳感覺他的弟弟受了委屈，帶了兵丁到耶穌會會院要求放人。¹¹當時馬相伯沒有離去，但與修會長上嫌隙更深，他曾抱怨他的長上檢查他的信件，又說他們不重視他的數學才能。長上見氣氛僵持，還請晁德蒞及修會其他長上調解。似乎長上曾和他提及離開江南傳教區，轉到直隸東南的可能性，長上勸他多做考慮，但他的心理狀況已不願等候，他在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五日向法籍會長高若天（Auguste Foucault）提出離會申請：

鑒於會長已給之特許，加之我的健康不適於傳教工作；會裏還阻斷我與家人的交往，又使我晝夜不寧；更進一步的理由是我的哥哥請我出會完成數學著述，政府還會給我一個驚人的高位，種種情景已使我不知所措。而他們的不斷邀請，使我不能等待你的答覆。事已至此，我不得不說和寫出如下的話，我再也不能用勸化世人的方式為我們的宗教服務了。¹²

一八七七年一月，馬相伯由其母陪同到董家渡請求寬恕，¹³這不一定是馬相伯的真實心意，很可能是被他母親強迫的。所以如此說是因為馬相伯並未接受轉往直隸東南或改任教區神父的要求，然後他被耶穌會正式除名。

第二階段：紅塵事業

¹¹ 馬玉章，〈懷念先祖父相伯公〉，《馬相伯與復旦大學》，頁 149（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5 月出版）。

¹² 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馬相伯集》，頁 1246。這是馬相伯離開耶穌會最接近事實的描述。所謂南京修院中骯髒的輔理修士，或是外國修士來滬，將他們兄弟房舍從向陽面轉向背陽面，都是事後的回憶。

¹³ 同上。

因為馬相伯的兄長馬建勳曾任淮軍糧臺，而淮軍系統中不少人在一八七〇年後，在滿清政府中任重要職務，馬相伯的洋學背景，遂使其在此系統中擔任幕友。他的弟弟馬建忠亦曾為耶穌會修士，但在一八七三年即退出耶穌會，並為李鴻章選派赴法，然後在一八七九年獲巴黎政治學院博士學位，李鴻章對馬建忠的賞識更勝於對其兩位兄長。應該這樣說，馬氏三兄弟都是李鴻章的幕友，馬相伯是其中關係最疏遠的。

馬相伯晚年回顧一生時，津津樂道於其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間參與朝鮮外交工作；但按照朱維錚的意見，在李鴻章幕中，真正負朝鮮外交責任的是馬建忠，馬相伯只能算是李鴻章的私人代表。¹⁴我個人認為朱維錚看法正確，不過不是中國政府官員，更可使馬相伯的活動具靈活性，而他和其弟馬建忠之間又可配合無間。所以他回憶稱自己任國王顧問，應非自吹自擂而已。

一八八三年從複雜的朝鮮局勢中退出後，馬氏兄弟被派去整頓經營不善的招商局。一八八四年七月，中法戰爭蔓延至長江流域，法海軍揚言阻斷漕運，劫持招商局海輪。馬建忠遂將招商局船隻名義上賣予美商旗昌洋行，使掛美旗繼續營運。消息傳至北京，廷議大譁，有稱馬建忠為小漢奸者。馬建忠被召至京，有將棄市處斬之說，在李鴻章力保之下，馬建忠到了天津，皇帝又命不必覲見。直至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結束，馬相伯再度作為馬建忠替身，出面與旗昌洋行談判，收回招商局船隻，清議對馬建忠兄弟的抨擊才逐漸平息。¹⁵

一八八六年，馬建忠建議李鴻章向美國借款設新式銀行；此議受李鴻章採納，於是沒有官銜的馬相伯再次以先遣的身份赴美協商。此事雖不見於官方史料，但當時赴美的馬相伯，以及充任馬相伯日常生活照顧者的朱志堯，皆曾回憶此事，朱志堯並將此行視為其人生發展一重要源頭。¹⁶美國銀行雖有強烈借款意願，但中國朝中官員則以為李鴻章藉機收取回扣。國內既然反對，貸款辦銀行無望，馬相伯遂帶

¹⁴ 朱維錚，〈近代中國的歷史見證——百歲政治家馬相伯〉，《馬相伯集》，頁 1178-1179。

¹⁵ 同上著作，頁 1182-1183。

¹⁶ 《黑牆頭、白牆頭、梅家弄》，頁 20-21。（上海朱氏家族傳閱本）

著朱志堯潛赴歐洲，據說他在羅馬還曾覲見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¹⁷

一八八七年馬相伯返回中國，此後他在政壇上銷聲匿迹，以他哥哥馬建勳為他們置下的龐大家產，在上海買地建屋。他退出政壇的原因，主要是對清朝政治的失望。另一方面他在退出耶穌會後，在山東辦理洋務時，與一山東女子結婚，共育二子一女。長子不知名，一八九三年與其母搭乘輪船返山東探親時，一起死於海難；次子名君遠，女名宗文。¹⁸他妻子的去世對他一定有相當程度的打擊。另一方面他在一八九四年出版了《新史合編直講》，也就是四福音書的合編本。¹⁹這本書應係自拉丁文本《聖經》整綴翻譯編成，不太可能是數個月就完成的倉促作品，因此馬相伯的內心深處其實已有重返教會念頭。

馬相伯母親沈氏在一八九五年去世，去世前馬相伯返家侍疾。沈氏對馬相伯離開耶穌會，以後結婚生子似乎頗為不能諒解，稱：「吾兒神父也，今汝已非神父，非吾兒。」²⁰沈氏去世後，馬相伯受此大刺激，遂決心重回修道生活，於是將一子一女送育幼院，自己赴佘山避靜一年，由其昔日同學沈錦標神父任神師，然後獲得教會赦免。按照方豪的解釋，神父絕不准結婚，因此馬相伯雖不再行使神權，但依法仍需守不結婚誓約。²¹此後馬相伯遂隱居於上海徐家匯，耶穌會門牆之外。

第三階段：信仰實踐者與政治批判者

或許是為了明確的表示他和世俗脫鉤，他在一九〇〇年將他名下分得遺產全數捐給江南代牧區主教。其目的是為了「日後所開中西大學堂收管，專為資助英俊子弟資斧所不及，…」這是一筆相當大的財產，包括「松青兩邑田三千畝」，「現洋四

¹⁷ 朱維錚，〈近代中國的歷史見證——百歲政治家馬相伯〉，《馬相伯集》，頁 1185。

¹⁸ 李天綱，〈信仰與傳統——馬相伯的宗教生涯〉，《馬相伯集》，頁 1248。

¹⁹ 朱維錚氏編的《馬相伯集》將此書置於 1894 年，方豪則置於 1901 年。

²⁰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上），《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六期，頁 29。

²¹ 同上。

萬元，英法租界地八處。」²²這時馬相伯年已六十，不會想到還有近四十年人生要過。

小馬相伯二十七歲的英斂之，在這個時期認識了馬相伯。英斂之以天津《大公報》社長聞名，在籌設之初馬相伯即為之尋覓人才，提供建言。²³兩人互相尊重，無話不談，不久即結為忘年之交。的確，以馬相伯的年歲，此後的朋友都是忘年之交。

馬相伯在一八九六年時在上海認識梁啟超，他當時五十七歲，梁啟超二十四歲。馬氏二兄弟的《馬氏文通》出版，梁啟超撰有序言，可見他們是不把梁啟超當晚輩的。他在一九〇二年識蔡元培，當時蔡元培三十五歲，他六十三歲。蔡元培還帶了二十四名從南洋公學離開的學生，就在馬相伯住的徐家匯老天文臺內，創辦了震旦公學，時在一九〇三年二月。²⁴開始時震旦採取學生自治制，雖然學校是得耶穌會允許，亦有數名耶穌會士從旁協助，不過似乎起初耶穌會並無太多干涉。²⁵

不久震旦發生風波。第一種說法是耶穌會是一個有自己教育理念的修會，教育的目的是要陶成剪裁學生天性，不久即不能接受此種學生自治制。一九〇四年從安徽來的耶穌會士南從周（Felix Perrin）在擔任教務長後盡改舊制，學生訴之於馬相伯，馬不願再與外籍耶穌會士衝突，遂辭職而去。學生聞訊亦相繼離校，震旦因而暫時停辦。²⁶另一種說法是清廷有意逮捕校中從事反清學生，因係教會支持之學校，暫未行動。馬相伯聞訊要求耶穌會方面不可答應，耶穌會則提出讓出部份管理權，馬相伯只得同意。耶穌會方面與馬相伯意見不同者有三：一為入學學生年齡；二為教授外國語文種類；三則為學生自治。導火線為南從周欲掌握學校財政，學生以此乃自治範圍不欲同意，馬相伯稱病不出，學生集會，一百三十二人有一百三十人簽

²² 〈捐獻家產興學字據〉、〈興學筆錄〉，《馬相伯集》，頁 36-37。

²³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上），《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六期，頁 42。

²⁴ 同上著作，頁 44-45。

²⁵ 同上著作，頁 45。當然這樣的學制很可能是出自這些富自由觀念學生的意見。

²⁶ 同上著作，頁 46。

字離校。而馬相伯事後得知，為學生感奮，同意學生離校，而他自己也離開震旦。²⁷

這群以馬相伯為核心的學生，離開震旦後即準備復校，但不久報端登出徐家匯震旦的招生廣告，馬相伯經昔日學生嚴復、熊師復、袁希濤等人商議後，決定更名復旦。經張謇、曾鑄等地方名流大力支持，又得兩江總督周馥撥吳淞營地七十餘畝，備建校舍，於是一個官紳支持及組織的復旦公學就在一九〇五年開辦。可以想見此時馬相伯與耶穌會關係，雖未全面絕裂，但一定冷淡至極。

同年為抗議美國的限制華工法案，馬相伯在上海參加抵制美貨運動。就人際關係看，發起抵制運動的紳商，不少即是成立復旦公學的支持者，而這兩件事情均具有民族情感因素，此為馬相伯參加愛國運動一個明顯的開端。

一九〇六年清廷宣佈預備立憲，但決心可疑。其時英斂之在《大公報》言論中不斷鼓吹立憲，提倡民權，其文字輯為「也是集」，請馬相伯撰序，馬相伯序中質疑清廷立憲誠意。他說：

舉世爭言立憲，唯百蠻及諸屬國無國民權利者，乃不敢言，言亦不能行也。強如俄國，弱如波斯，已無不勉強而行之；故我國不言立憲則已，言立憲而不虛心預備，言預備而不實力奉行，雖如綸如綍以言之，究與不敢言者，相去幾何？

28

然後一九〇七年以梁啟超為首，主張君主立憲的一派人士，在東京組織了政聞社，邀請馬相伯任總務員（按：差可比擬總經理），馬相伯當時正與上海士紳爭取滬杭甬鐵路民辦，聞訊後即慨然應允，渡海東瀛，籌備社務。²⁹時為一九〇七年十月，馬相伯已六十八歲。政聞社是一個鬆散的組織，總務員做的事可多可少，不過由此可見他此時在這些新知識份子中崇高的聲望。

²⁷ 韓希愈，〈馬相伯的辦學治校〉，《馬相伯與復旦大學》，頁 215-216。（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一版）。

²⁸ 〈也是集序〉，《馬相伯集》，頁 68。

²⁹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上），《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六期，頁 49-50。

在和教會關係方面，不敢說已恢復正常，但至少在耶穌會內他是有同情者的。代表人物是這時擔任震旦公學校長的李問漁神父，他接連編輯《墨井集》、《古文拾級》等書，馬相伯皆為之作序。³⁰然後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連續三年的震旦畢業典禮暨結業式，馬相伯皆前往演講。³¹

辛亥革命前，馬相伯被歸類為立憲派人士；但辛亥革命後，各省響應者，大半亦皆原立憲派人士也。在各省脫離清廷過程中，江蘇省部份，馬相伯參與甚深，曾任江蘇代理都督，其時已七十二歲，他當時的貢獻主要是維持地方秩序。民國成立後，昔日政敵袁世凱聘其為總統府高級顧問，乃在八月份由上海北上。

一九一二年九月，馬相伯和英斂之合撰〈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這是推動民國初年天主教本地化運動的一份重要文獻。他們兩人主要是向教宗陳訴，明末清初傳教士甚重學問，但十九、二十世紀傳教士不重學問。基督新教英、德、美人俱已在中國開辦大學，但「獨我聖教尚付闕如」，「無怪明末清初，人才輩出，今也何如？教中所養成者，椎魯而已，苦力而已，求能略知時務，援筆作數行通順語者，幾寥落若晨星。」因此希望教宗「多遣教中明達熱切諸博士，於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創一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³²

先生此時年歲已高，政治及社會頭銜或許仍在，但馬相伯與實際之政治活動已逐漸脫離，他曾短暫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但兩個月即離職。復旦公學復校後，他不久亦離校長職，推教務長李登輝接任。³³此後他政治批判者的位置就更清楚了。

一九一四年初總統袁世凱提出祭天祀孔案，並經政治會議通過。七十五歲的馬相伯反對總統擔任祭天祀孔主祭，撰文〈一國元首應兼主祭主事否？〉主張國家元

³⁰ 見《馬相伯集》，頁 99、101。

³¹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上），《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六期，頁 55-57。

³² 《馬相伯集》，頁 116。可見此時震旦、復旦皆未及大學水準。

³³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下），《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七期，頁 4（台北：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1975 年 9 月出版）。

首應超出各宗教之上，若擔任祭天祀孔主祭，則隱含一宗教超出其他宗教之上的意味，亦違反政教分離、宗教自由的原則，當然馬相伯也瞭解袁世凱藉此推動帝制的意圖。³⁴待袁世凱帝制失敗，憂憤去世，恢復的民國開始制定憲法，這部「天壇憲法草案」竟然在其十九條中提出：「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這其實仍是以孔教為國教的思想，馬相伯站在宗教自由立場繼續撰文反對，民國五年可說是他此類政論文章最多的一年。³⁵

在這個時期最能總結馬相伯憲政民治思想的是一九一八年發表的〈民國民照心鏡〉。他自己就是所謂的「民國民」，也就是具有民主素養的國民，而「照心者，反躬自省也。」其意即為從民主之基本原則出發，觀察所謂民國的諸種亂象，並根據中國的實際情形，提出他對民國政體的建議。他一方面感慨於社會大眾對於民主的無知，亟思藉此文加以啟蒙；而在落實民主治政及現實政治上，他主張「南北分治」、「聯邦制」、「地方自治」。³⁶當時馬相伯已七十九歲，該篇長文一萬八千餘字，一方面可見其精力及頭腦之清晰，另一方面亦顯示他愈益昌盛對人群及人生之熱情。

除了面對廣大一般民眾外，馬相伯不因年歲增長而消滅的熱情，其實更針對當時的中國天主教教會。當民國四年至五年在天津老西開地方，法國政府強行擴張租界，比利時籍的雷鳴遠神父與埃及籍的湯作霖神父，支持天津群眾的反對活動，並因而遭到教會當局的限制時，他和英斂之以實際行動給予支持。民國七年教廷有與中國通使之議，已公諸報端，但又因法國強力作梗而停止時，在他寫給英斂之信中充份表達其痛恨之意，文中有言：「不當使中華教會，常為寄生物、殖民地之類。」³⁷這種思想是其理想的中華教會結構中，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種對中華教會結構的扭曲，主要來自於以法國保教權為主，所形成的外籍傳教士對教會的控制。羅馬教廷自馬相伯、英斂之的〈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以及老西開事件時雷鳴遠、湯作霖的報告已知曉大意。再經過中梵雙方通使受挫的直接

³⁴ 同上著作，頁 18。同年類似的文章還有〈信教自由〉。

³⁵ 朱維錚，〈近代中國的歷史見證——百歲政治家馬相伯〉，《馬相伯集》，頁 1199-1202。

³⁶ 同上著作，頁 1202-1207。朱維錚比較了一些當時在報刊上的民主言論，說明馬相伯。

³⁷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下，《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七期，頁 45。

經驗，教宗本篤十五世於民國八年委託廣東主教光若翰為中國教務視察員，攜教宗問題二十八條，詢問教士教友意見。當時北京教友未見其文，但隨後抄來法文版本，即由馬相伯撰「代擬北京教友上教宗書」表達意見。文中對於外籍傳教士的種族意識，修會間的地盤主義，不重視學問的傳教方式，不通中文，歧視及控制華人司鐸頗多批評。³⁸凡此，一方面代表了馬相伯的宗教思想，一方面也可說是日後中華教會改革的指導思想。

在光主教仍在中國巡閱時，教宗本篤十五世在民國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即發表〈夫至大通諭〉。雖未點名中國，但其中對歐洲傳教士所抱有的國家主義思想，多所指責。通諭中思想與馬相伯及英斂之等人若合符節，此後中國天主教史進入另一階段。教廷接著開始推動在中國設立一公教大學，此為對馬、英二人上書的直接回應。然後教廷在民國十一年派遣了剛恒毅總主教以宗座駐華代表身份來華，打破了法國保教權的控制。接著是本篤會來華籌設大學，民國十四年輔仁大學的先修班輔仁社成立。接著是民國十五年首批六位中國主教，赴羅馬由教宗庇護十一世親自祝聖，其中的江蘇海門主教朱開敏是馬相伯的親外甥。這些事情的發生，一方面與馬相伯的推動有關，另一方面馬相伯亦在其中看到了中國天主教的希望。在這一片中國天主教本地化的新氣象中，馬相伯無疑是其中最受人尊敬的長者，他此時及其後已不需再實質做什麼工作，因為他的想法已可由年輕的一輩繼續實踐。

第四階段：抗日呼聲

教會的問題不需要他再呼籲了，但民國二十年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使得馬相伯很自然的以老青年的身份再次站上講臺。他從一八八二年開始即有與日人在朝鮮交手的經驗，近五十年經歷，使他對此時日本的全面侵略，再也無法忍耐。當馬占山率領的東北義勇軍開始武裝抗日行動時，他號召全國百姓給予支持。³⁹當時人稱

³⁸ 同上著作，頁 56-58。

³⁹ 〈勸國人慰勞東北抗日軍隊〉，《馬相伯集》，頁 522。〈九二老人病中語〉，《馬相伯集》，頁 526。

日本之侵略為「國難」，政府也在民國二十年底，宣佈將召開國難會議，馬相伯以九一高齡亦名列會議名單之內。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進攻上海，馬相伯謝絕避居租界之請，仍居於土山灣危樓之中。⁴⁰

馬相伯不只是呼籲抗日，他認為要解決「國難」，必須有正本清源之計。這種思想在其〈國難芻議〉中表現的很清楚。他以為「民治」是最基本的問題；所謂民治就是民權得到完整的保障及伸張。他解釋說：

整個人民，鄉邑歸鄉邑，州郡歸州郡，家家戶戶，自出財力，自出心力，以自治也。大抵不外用政事以統一人民，利用土地，鄉黨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國內交通則願出於其途，居處則願藏於其市，水火工虞農牧，又皆能以科學智，而通功易事焉。⁴¹

要達到這種境界，必須人民意識有所改變；改變之法，他以為「僅以儒佛道之法，未免太迂太晦，故莫如徑用天條十戒。」

除民治外，他認為以中國土地之大，應倣效美國行「聯邦制」，並訂定聯邦憲法，確實執行。這樣做的目的，是要重建民國，「昭示天下，中華人民奉『民胞物與』之大訓，尚能團結一德一心，以抵抗天災之洪水，人禍之猛獸。」⁴²〈國難芻議〉是在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國難會議上發表的，其時日軍攻打上海，製造偽滿州國，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馬相伯組「不忍人會」，援助各地抗日活動。

「民治」、「聯邦」並非這個時期馬相伯才形成的思想，民國肇建之初他已經如此主張。十餘年後老調重談，一方面可以看出馬相伯絕未涉及實際政治，不然不會提出此類空中樓閣的理想；另一方面亦可看出馬相伯對政治實況的不滿，他不斷提出民治，即表示民國以來民權未曾落實。不論是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混戰的軍閥，乃至現在所謂訓政的國民政府，都該為民治不彰負責。而此時實施訓政的國民黨，

⁴⁰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下），《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七期，頁 87-88。

⁴¹ 同上著作，頁 88。

⁴² 〈國難芻議〉，《馬相伯集》，頁 922-925。

當然不合於主權在民的原則；他不斷提倡抗日，而國民政府卻不斷退讓，這是另一個讓他不滿的因素。

這種因抗日及民權思想而產生對政府的不滿，在當時的知識份子中有一定程度普遍性，而馬相伯基本上是與他們立場一致的。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蔡元培及宋慶齡等人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馬相伯應邀參加。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沈鈞儒、章乃器等人組各界救國會，馬相伯也實際參與組織工作，某些會議甚至是在其寓所中進行的。在一些馬相伯門生的回憶性文章中表示，馬相伯同情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反對國民黨「先安內後攘外」的說法。⁴³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救國會沈鈞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時、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等所謂七君子被捕，差不多同時，甫就任南京主教的于斌也登門親訪馬相伯，邀請其入南京居住。不論當時的政治評論者或是以後的歷史學者，都很自然的將這兩件事連在一起，認為馬相伯是在國民政府的壓力下入京，被帶離他鬧事的上海。馬相伯自己的說法是因為有了國籍的南京主教，加上頗為賞識于斌，曾經多次對其孫女馬玉章說：「中國教會終於有了中國籍主教，我是中國人，應當幫他的忙。」馬玉章認為：「相伯公公開主張抗日救國，于斌上門，決不能公然替蔣介石的賣國獨裁政策做說客。」⁴⁴話雖如此，但于斌主教為何登門請馬相伯赴南京？其中難保不具有某些政治影響。另外，他赴南京前，曾請馮玉祥設法營救七君子；他在南京時又是由馮玉祥及于右任為其謀得國家薪金，保其生活無虞；凡此種種，皆可從中嗅出運作味道。無論如何，西安事變後，國民黨為抗日再採聯共立場，馬相伯的抗日優先，此後即與政府立場差堪相同。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後，隨著首都遷移，馬相伯一家人亦隨之在十一月遷往後方。至桂林時，因廣西政府堅決挽留，乃留居桂林風洞山。二十七年十一月，廣東已被佔領，欲再往雲南昆明進發，道經越南諒山，因馬相伯年邁不勝奔波之苦，遂停留於此。似乎馬相伯對蔣委員長是否抗日仍然信心不足，他常問來訪賓客：「蔣

⁴³ 韓希愈，〈愛國老人馬相伯〉，《馬相伯與復旦大學》，頁 123。

⁴⁴ 馬玉章，〈關於馬相伯創辦震旦大學及其他〉，《馬相伯與復旦大學》，頁 250。

介石這小子會打仗嗎？」「蔣介石這小子打得好不好？」⁴⁵他當時不知在越南境內，因其不願踏出國境之外。根據此時非常關心馬相伯起居的方豪神父表示，在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中，因諒山氣候劇變，馬相伯有發燒症狀，一直未見痊癒。十月底湘北國軍大捷，「興奮過度，雖能起坐，且略進飲食，但不易入眠，而病勢益劇。十一月三日意識仍然清醒，但已無法言語，延至十一月四日去世。」⁴⁶他雖死在諒山，但死後並不孤寂，重慶國民政府為他舉辦了隆重的紀念會，雖然他與蔣委員長並不同調，但對這位愛國老人的尊重，不管屬於何方陣營都是一樣的。

貳、思想內涵與歷史定位

吾雖為平信徒，但與馬相伯先生一樣受耶穌會培育；吾僅知皮毛，卻也對馬相伯的信仰核心——「神操」略知一二。故敢私心揣度，大膽推測馬相伯的思想內涵。總結來說，五十七、八歲以後的馬相伯，思想的核心是信仰。和一般宗教人相比，馬相伯在三十七歲離開教會稍微晚了一些，但他五十七歲回歸教會，更可說是奇事。而天主此後還賜給他豐富的人生，讓他可以有四十餘年為信仰服務。本節所述僅論其後半段穩定的信仰生活。

一、愛教

根據神操的經驗，作為一位效法基督、跟隨基督的人，馬相伯的人生就不再是求己之發展，而是和基督一樣，準備為大眾服務和犧牲。很可能在懺悔時，馬相伯並不覺得他娶妻生子有何過錯，因為這是他過世俗生活的正常途徑，真正的問題是他曾經選擇了世界的榮華富貴，丟掉了跟基督的想法。

⁴⁵ 同上著作。

⁴⁶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下），《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七期，頁 107-108。

過修道生活的三願：絕財、絕色、絕意。馬相伯當時離開教會的導火線，主要是第一項及第三項；當他重回教會後，非常具有象徵性的舉動，就是把他所有的龐大地產交付給教會，比他把小孩送入育幼院的時間為晚，也更具有代表性，表示他從此不再與世俗有何瓜葛，而當然耶穌會也應有照顧他的責任，雖然他只能依附在耶穌會門牆之外。

此後對財富的處理，也可看出他信仰的態度。他似乎不再積蓄任何財富，當他有政府津貼時，他全權委託其他人為其經手。例如民國元年至四年，他寓居北京時，他將薪俸交英斂之妹英貞淑，培根女校校長全權處理，實際上部份即資助培根女校。⁴⁷當湯作霖神父為老西開事件被剝奪神權時，他也拿錢出來贊助。最令人感動的，是民國三、四年間，其子宗文去世，留下寡媳馬邱任我及六個月大孫女馬玉章，其學生輩知其毀家興學、素無積蓄，乃共贈萬元，作馬玉章教養之用。但馬相伯將這一萬元轉送給了陸伯鴻，作為啟明女中的辦學經費。⁴⁸以後照顧寡媳和孫女也成了馬相伯責任。⁴⁹

因為信仰是他生活的中心，因此他重要的宗教性著作及言論皆撰作於這個階段。與時事有關者前已提及，此處不論，與時事無關者，馬相伯平時的主要工作似乎在此。他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七日，在北京中央公園演說「聖經與人群的關係」，稿長兩萬六千字，多引中國古書古訓，與聖經相互發明，⁵⁰很明顯是用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方法。同時很多處談到十誡，則又針對當時社會情形，頗多針砭。他的結語說：「對於人群，從消極的先說，毋殺人、毋邪淫、毋偷盜、毋妄證，那積極的功夫，一要恕道，二要誠實，三要謙恭，四要知止。」⁵¹馬相伯不滿於當時中國教會不重學問的傳教方式，心儀於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所編譯的傳教書籍，於是與英斂之、陳

⁴⁷ 〈致英斂之先生書〉，《馬相伯先生文集》，頁 160（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影印出版）。

⁴⁸ 馬玉章，〈懷念先祖父相伯公〉，《馬相伯與復旦大學》，頁 151。

⁴⁹ 因其捐資設立震旦公學，以後學校歸耶穌會，故民國六年後，江南代牧區姚主教規定按月給付馬相伯三百元生活費。

⁵⁰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下），《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七期，頁 35。

⁵¹ 〈聖經與人群的關係〉，《馬相伯集》，頁 221。

垣等人搜羅其書，在他們手中重刊者有《辯學遺牘》、《主制群徵》、《利先生行蹟》、《真主靈魂理證》、《靈魂道體說》、《靈言蠡勺》等，諸書皆由馬相伯撰序或作跋。他自己則在回教會之初，就編了《新史合編直講》，然後在他人生的最後三年，他完成了四部福音的譯作，稱為《救世福音對譯》，此為清末民初四福音書數種翻譯版本之一。⁵²

在馬相伯宗教性作品中最有意思的是《靈心小史》。這本書是法國聖女小德蘭的自傳。小德蘭出生於一八七三年，還晚於馬相伯三十三年；入聖會修道，一八九七年去世。小德蘭在一九二三年封聖，是罕見離世僅二十八年即被封為聖人者；從未離開聖衣會的小德蘭，在一九二七年被教宗列為傳教主保。馬相伯很明顯的也是小德蘭迷，吸引他的是小德蘭信仰生活中似嬰孩的單純。他引用教宗本篤十五世的話描述小德蘭：

須知仿效嬰孩聖女也該如此，一味靠托天主，由天主抱東即東，抱西即西，百泰平安，百無禁忌。就消極一面論，她絕不敢依仗自己能力，絕不敢借用世上方法包辦天上工程，…若就積極一面論，她必堅心相信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故隨時隨地崇拜天主全能，欽仰天主仁慈。世上千變萬化無一不由天主全智安排停妥，備有種種神恩：要趨善避惡也可，要趨吉避凶也可。所以嬰孩聖女隨遇而安，無往不利，其妙用有如此矣。⁵³

這個對小德蘭信仰內涵的描寫，無疑也是馬相伯自己信仰的寫照。

二、愛國

教宗立從未出外傳教的小德蘭為傳教主保，一方面是肯定祈禱對傳教工作的重要，另一方面亦顯示信仰必須紮根於生活之中。對馬相伯而言，他的信仰必須在他

⁵² 稍早有香港教區較白話的版本，稍後有吳經熊氏的譯本。

⁵³ 〈靈心小史導言〉，《馬相伯集》，頁 742。

所處的社會中間實踐，換一個方向看，馬相伯的政治主張，實基於他的宗教信仰。如同耶穌愛人一般，效法基督的馬相伯在其經驗中，必定也是愛人的。愛什麼人？當然是愛那些弱小者，未受公平對待者。當時中國在歐美日帝國主義思想影響下，往往被以次等族類對待，此為馬相伯提倡愛國之理由，他愛國是要助國人擺脫不平之對待也。從一九〇五年參與抵制美貨運動，然後是在教會內與法國保教權的對抗，乃至民國二十年積極呼籲抗日，其來源都來自於馬相伯自信仰而生的愛人之心。

英斂之曾撰《萬松野人言善錄》，為紀念亡友，馬相伯將其在天津益世報的講話，稱之為《華封老人言善錄》。其中所論，將其抗日愛國立場說得非常清楚。他說：「老人為什麼抗日？因為日本侵略違反人道！」接著他解釋人道：

救世主親諭曰：『我有新命，勅付爾等，俾爾等彼此互相友愛，宛如我之親愛爾等，而爾等亦彼此互相友愛也。眾將以此審知爾等實為我徒，要在爾等果有互相親愛之情焉耳。』（〈若望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至三十六節）這是真實的人道主義。以前單說愛人如己，現在我們愛人，要效法救世主愛了我們；流盡聖血，救拔人類！人愛人，也要愛到如此田地；不單救人眼前的性命，更該救人長生的性命；救世主降生欽定的新遺囑！我敢不宣揚給同胞同志麼？⁵⁴

從這種愛人的信仰而生的愛國觀念出發，馬相伯其實是反對一切對人權及人命的傷害，包括不正義的政府在內。因此可以說，馬相伯因為愛國，所以經常是站在政府對立面的。也是因為愛國，所以他也見不得同胞獨善其身，不恤鄉里，乃至彼此相凌。因此他說：「同胞每恨外人的侵凌；須知外人敢打中國，欺壓我到這地步，多緣執政不愛人民，人民又不自喜，又不相愛，好像父母日日打罵子弟，兄弟又內鬥不了，所以外人來欺凌了。故此人民自救要自治！」⁵⁵

同樣的，從宗教精神出發，馬相伯的愛國不主張報復。他說：「因此，我們照人道主義行事：所謂攻其惡，並非來復仇！…談到暴行的反面是善行，我們制裁暴行

⁵⁴ 〈華封老人言善錄〉，《馬相伯集》，頁 970、972。

⁵⁵ 同上著作，頁 974。

的人，對於應有的善行義舉，是義不容辭的，是善與人同的。」⁵⁶所以他呼籲組織的「不忍人會」是慈善性質的，他引若望福音的話說：「『爾不識我，亦不識爾父；倘爾識我，亦識我父。』須知“民吾胞也”，我們共戴一在天我等父者；所以我們應該彼此互相親愛，才算盡了救災卹鄰的天責，不愧為真實的人道主義者。」⁵⁷

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大陸學者認為馬相伯是較為傾向於共產黨一邊的。這樣的看法不完全正確，一方面國民黨是執政者，在民國成立以後，馬相伯對所有的執政者都不滿意。另一方面在當時共產黨的宣傳中，他們將自己塑造為抗日的政黨，攻擊國民黨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團。因此在馬相伯的言論中，或有所謂贊成共產黨者。⁵⁸但他贊成的是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並不是共產黨的理論。共產主義中的無神論，稱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馬相伯在〈宗教與文化〉一文中稱：

國軍血戰抗日，為效忠國家，尚博得好評。那麼，億萬教眾，對造物主欽崇孝愛，矢志靡他，這是叫受了麻醉嗎？……宗教對於民眾，真理教化人生，使人心悅誠服，是對於造物主的欽崇，而自動來克己復禮，以救世主之心為心，唯造物主之命是從。故犧牲一切的一切，都是反本歸原，所謂人事盡矣！毫無麻醉意義，極為顯明。⁵⁹

如此聲明的馬相伯，對他而言共產黨也只是他的統戰對象而已。

三、歷史定位

從明末天主教在中國紮根以後的歷史發展來看，清末民初時期的馬相伯是可以和徐光啟、李之藻齊名的人物。他不僅是教會中的名人，他同時也是社會中的聞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天主教徒，他也從不避諱他的天主教徒身份。當然他在北京公園裏

⁵⁶ 同上著作，頁 976。

⁵⁷ 同上著作，頁 977。

⁵⁸ 韓希愈，〈愛國老人馬相伯〉，《馬相伯與復旦大學》，頁 123。

⁵⁹ 〈宗教與文化〉，《馬相伯集》，頁 564。

演講聖經與人群的關係，或是談用十誡救國，會信從的有幾人，是值得懷疑的；但他受尊重的程度，則是無庸置疑的。藉著馬相伯的現身和宣講，天主教給人的印象，不再是外來的洋教，而至少是可以被容許在生活周遭出現的。

如果從清末民初中國天主教的環境來看，馬相伯是推動中國天主教本地化運動的領導者。這個運動在一九〇〇年後逐漸展開，此時也正是馬相伯重返教會，隱而未隱，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後半期。這些實際推動中國教會本地化的人物雷鳴遠、英敏之，都自動的滙聚於馬相伯的身邊；剛恒毅來華後，他是教友擁戴之首。首批六位國籍主教中，或因有他的親外甥，他未置多詞，但隨後的南京主教于斌，他則與之密切配合。陸徵祥入本篤會後，一直與馬相伯保持密切通信往來。方豪神父津津樂道於他以二十九之齡，得在桂林風洞山晉謁九九老人，並以侍終為榮。這些尊重，都可看出馬相伯在中國天主教本地化運動中，先知先覺者的位置。

在非教會人士中，馬相伯隨著年齡增長也聲望益高。早期是因他懂洋務西學，然後是因為他參與立憲運動，又創辦了震旦和復旦。這些參與政治的上流社會人士，發現了馬相伯關心政治，但又和政治保持距離；言論真切，鞭辟入裏，心口如一，且全不為己謀。相處愈久，自然敬重愈多。晚年則是看到馬相伯老青年的活力，呼籲抗日，大多數年輕人只能自嘆弗如。不過，因為他們不瞭解馬相伯的宗教信仰，因此最多只在馬相伯身上看到類似儒家「民胞物與」的精神，或很自然的將自己的黨派意識投射於馬相伯身上。因為不瞭解馬相伯的宗教信仰，這些看法都不全面，不過身為一位宗教家，馬相伯的立足點是遠遠高於黨派之上的。他不是一位天主教左派，他也絕不是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精神導師，他就只是一位在愛主愛人的觀念下，愛國的中國天主教教徒。

參、結語

馬相伯的人生準則，說得最透徹的是方豪神父。他說：

先生一生所為，一以正義、真理為依歸：方其襄贊梁任公之政聞社也，或以為

先生乃反對 國父孫中山先生者，然南京光復，一時頗呈紛亂之象，先生以地方耆老，出而收拾人心，社會於以安定；先生之在韓協助新政，辦理外交，袁世凱官位低微，及任總統，對先生禮數甚重，先生欣然北上，以為可以為「民國國民」謀福利，及袁氏稱帝之心既露，先生不屑一顧。九一八後，先生力主抗日，或又以為先生不與政府合作，及中央政策既定，先生即入贊中樞，不稍猶豫；先生為天主教世家，可遠溯至明季；幼年投身修道院，稍長入耶穌會，但當遭遇無理高壓之時，即毅然出會還俗；及其辦震旦大學也，為莘莘學子計，先生又與耶穌會合作，並慨贈龐大校地與鉅額捐款；迨耶穌會士擅改其手訂學制，學生于右任等憤而離校，先生辭職以去，並協助創辦復旦。先生早歲對教會似是叛徒，然晚年仍歸於虔誠，整理教會文獻，重譯聖經，盡忘往年耶穌會所加之種種壓迫，此余之所以謂先生一生行事，悉以真理、正義為依歸也。⁶⁰

他的真理及正義來自於信仰，不僅超越國家，也超越了當時中國教會的限制。其實要體會馬相伯並不困難，在很多中國神父身上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他所提倡的許多觀念，再經過于斌樞機的提倡逐漸在中國神父身上展現，變為正當而不需言明；甚至許多外籍傳教士，也在時代的反省中，修正了當時的優越心態，他們雖還未能重回中國傳教，但在台灣已經發光發熱，展現了基督追隨者及傳播者的本色。

⁶⁰ 方豪，〈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上），《天主學術研究所學報》，第六期，頁1。

Love for the church and country— The principle of Ma Xiangbo's life

Chen Fang-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Ma Xiangbo was a well known Catholic figure in China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early Republican era. However, he once left the Church, there is relatively less references to him in work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gives some basic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Ma. This will allow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role Ma played in the movement to localize Catholicism in China after 1900 and will also demonstrate how well respected Ma wa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hurch.

Secondly, Ma's sense of patriotism caused him to become dissatisfied with the policy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the time, which emphasized the handling of internal unrest prior to and more urgently than the promotion of China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Ma thus joine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Society' which was viewed as a left wing grou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viewed Ma as a left wing Catholic because they believed he was a forerunner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its beliefs. In actual fact, Ma Xiangbo's ideas of patriotism and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prang from his religious qualities of compassion and unconditional love for all living things. All Catholic figures, whether they were viewed as left or right wing by the CCP, embodied such ideals.

Religious wisdom refers to true insight and wisdom that transcends the everyday world and its practices. The central thought and life goals of Ma Xiangbo must be consider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eligious wisdom. Any attempt to understand his thought and life without this

background will prove fruitless.

Keywords: Ma Xiangbo,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The Chines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